

## 前 言

这里选編了十个从离散到团圓的故事。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故事，而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訴和对新社会的热情贊歌；这不仅是十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情景，而且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在旧社会里，飽受剝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有多少个家庭，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害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請看，《佳节会亲人》这一故事的作者李显紅同志，他的家在旧社会里是个什么样子：弟弟和妹妹被餓死了；母亲被地主、劣紳逼着卖了还債；父亲被地主害死了；最后只剩下年幼的李显紅，也逃不出敌人的魔掌，被他們卖給了別人。再看看《海底捞針》这个故事：何蓮真原来是一个“吹鼓手”的女儿，在旧社会里一連被逼卖了三次，头一次是被父亲用土車子推着到长沙城里卖掉的。解放以后，长沙市公安局西区分局在为她寻找亲人的过程中，竟发现解放前有四个“吹鼓手”用土車子推着女儿卖到了长沙城里！可見，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是有着多么悲惨的共同命运！

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了身，作了主，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其中許多家庭，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已經找到了过去离散了多年的亲人。有些人年紀很小就同家人离散了，有的人甚至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就离开了亲生父亲，他們和自己的亲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地址，或者不清楚对方的姓名，他們要找到自己的亲人，真象是“海底捞針”一样。然而，在党和阶级兄弟的关怀下，终于捞起了“海底的針”。《海底捞針》这

个故事，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事例。人民公安干部周少云同志，想着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怀着对阶级姐妹的无限深情，就一連跑了五个县市、六十三个机关、十五个公社、七十二个大队、一百四十二个生产队、七十一条街道、三十六条船只，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使何莲真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

讀着这些故事，两个社会，两种遭遇，对比是这样鮮明，使我們不能不更加憤恨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不为劳动人民在新社会的幸福而欢欣，更不能不被我們党和人民的干部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劳动人民翻了身，生活过得越来越美好，但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灭亡。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就正在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企图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国；它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唆使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我們劳动人民，能够容許敌人再来剝削、压迫我們，使我們回到旧社会那种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深渊里去么？不，我們絕對不能答应！我們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斗争到底！讓我們看了这些故事，更加牢记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里的苦难，把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化为巨大的革命力量！

**編 者**

一九六五年七月

## 目 录

前言.....	(1)
“海底捞针”.....	(1)
遗女寻亲.....	(15)
兄妹悲欢.....	(22)
母子团圆记.....	(29)
五姓兄弟.....	(33)
三个母亲的故事.....	(39)
我终于找到了亲爹.....	(46)
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爹.....	(52)
团圆.....	(58)
佳节会亲人.....	(64)

# “海底撈針”

——公安干部周少云帮助何蓮真找到亲人的故事

彭香林 譚国材

## “炭耙子街”和“蕩巴子街”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长沙市西区公安分局，接到由市公安局轉来湖北省沔阳县胡家場区公所赵宗德同志一封来信。信中說到：他母亲叫范长珥，現年五十六岁，老家住在长沙市南門蕩巴子街二十四号。范长珥的父亲是个海員工人，但不知道他叫范（也許姓万）什么名字。她老人家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記不得叫什么名字了。当时范家很苦，她只記得自己是在十三岁的时候被父亲卖掉的。至今不知亲人下落。因为思念失散的亲人，她不知流过多少伤心的眼泪。今天翻身了，她要求公安部門想方設法帮助她找到亲人。分局同志象对待所有的群众来信一样，認真地研究了这封来信，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給周少云去完成。

周少云接受了这项任务，把信看了又看，眼前的綫索仅有个“蕩巴子街”、“姓范(万)”的“海員工人”。可是，“蕩巴子街”在哪里呢？他在长沙作了十来年的公安工作，就是沒听說有什么“蕩巴子街”，問其他同志也不知道。后来，老周想起了自

已在二十多年前来长沙做木工的时候，曾經听说南門附近有条“炭耙子街”，后来改名叫学院街了。是不是“炭耙子街”就是“蕩巴子街”呢？于是，他来到学院街訪問。老人們都笑着回答：“同志，半百年的事了，誰还记得啊！”有的老人說：“不錯，原来这里叫‘炭耙子街’，不叫‘蕩巴子街’。可是，那条‘炭耙子街’，在解放前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放火烧得一干二淨，原来住在这条街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現在到哪里去查这些事情哪！”老周反复地思考着，他想：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訪問有沒有过去在“炭耙子街”住过的老住戶。为了找老住戶，每天，他早出晚归，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也不休息，不辞劳苦地訪問了学院街附近的南墙灣、修文街、文庙坪、黎家坡、豆豉园、半湘街等街巷的上百个老居民。但是，事情仍然茫无头緒。

### 老海員的回忆

老周並沒有灰心丧气。他又在姓范和姓万的海員工人的綫索上想了很多办法。首先，他来到市公安局，在市局同志的协助下，从全市八十万人口的戶籍卡中把姓范姓万的名字、住址都抄了出来，根据年龄、职业，一个一个地查訪。但是沒有結果。接着，他又来到长沙港务局找綫索。港务局的同志們热情地同老周一起，把全局干部和海員中姓范和姓万的以及姓顏、姓阮的人的名字、住址都抄下来了。这些人的住址遍及全市各个角落，老周一个一个地訪問了，然而，希望又成了泡影。老周曾經在水上派出所工作过一段時間，他想：訪問水上船民也許能够找到一点綫索。于是，他除訪問了好些本港船只以外，还

訪問了从常德、益阳、双峯、宁乡、湘潭、衡阳以及湖北来的外港船三十六只。这样，也还是沒有結果。这时，长沙港务局的同志又对老周說：“你再去訪問那些已經退休了的老海員看看，也許能弄出点名堂。”老周又根据港务局同志提供的退休老海員名单，进行了紧张而艰苦細致的查訪工作。他从这家走到那家，一連走訪了几十家退休老海員，还是沒有着落。在退休老海員中沒有找到綫索，他又来到了省交通厅內河航运管理局查訪。管理局人事保卫科的同志热情协助老周查閱了省内河各港口的姓范姓万的海員名册和档案，仍沒有找出一点头緒。但是，他們向老周提供了一个重要綫索，要他去找“活档案”——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共产党员、七十多岁的老海員工人范德发同志。

一个星期天，老周来到了范老的家里。范德发这个在旧社会受了一輩子苦的老海員工人，听老周說明来意以后，深深地为赵家阶级姐妹的遭遇和今天的人民公安干部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感动。他回忆往事，禁不住老泪纵横，向周少云訴說了自己过去骨肉分离的一段辛酸血泪史：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日本鬼子侵入了长沙。就在日本鬼子侵犯长沙的那年，范老带着他的爱人和儿女往广西桂林逃难。当逃到金城江的时候，全家被冲散了。范老急得沒有办法，只好跑到伪警察局去請求代寻亲人。那些如狼似虎的伪警察，凶神恶煞地对范老說：“你带了多少錢？沒有錢誰替你去找亲人！”范老还想再說几句，不料几个大耳光早已落在他的脸上了，接着就是几脚、几槍托子，把他赶出了伪警察局



的大門。解放以后，搭帮毛主席的领导好，人民公安干部帮他把那过去失散的子女找到了，可是他的妻子，一直到現在还下落不明。談起这段苦情，范老无限激动地对老周說：“旧社会使人妻离子散，伪警察只顾敲詐勒索欺压人民，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公安干部才这样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新旧社会，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最后，当話題轉到赵宗德的母亲找亲人一事的时候，范老說：“就是沒听說过‘炭耙子街’有姓范的海員卖过女儿这回事。”

老周从范老家里回来，思想很不宁靜。一方面，范老和許許多多老海員在旧社会的种种遭遇，使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階級教育；另一方面，这次助人寻亲人的工作已經进行了一个多月，綫索一个一个地断了头，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再找嗎？任务又沒有完成。怎么办呢？他很苦恼。这时，有人劝他：“写封信答复对方：‘查无此人’。你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样答复人家，总不能說是不負責任吧！”老周带着矛盾的心情，向分局領導同志和党支部汇报請示，領導上肯定了他前段工作的成績，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領導同志对他說：“写封‘查无此人’的回信，这倒容易，提笔就可以写成。但是我們作为一个人民的公安人員，能够这样去对待人民群众的囑托嗎？……”最后，領導上給他出了一个点子：赶快写封信給赵宗德，請他母亲尽可能地再提供一些新情况和一点一滴的綫索。

### 新的“蛛絲馬迹”

不几天，赵宗德回信了，提供了如下新情况和綫索：

他母亲的老家不是在长沙南門蕩巴子街，而是住在市郊的一个小村庄（具体地名記不清），住的屋是一个剪刀形的茅草棚子，屋后有小山，山上有毛栗子树。她亲生父亲姓何（也許姓賀，記不得名字了），是个吹鼓手。过去，她家里穷得揭不开鍋盖，母亲被迫帮別人做‘女仆’。后来家里又被盜，几件破烂东西也被偷得精光。父亲实在养不活女儿，在一天清早太阳沒有出山的时候，用土車子把她（当时还只有八岁）推往长沙市南門蕩巴子街，給一个姓范的海員工人做养女。从此，她便改名换姓叫做范长珥。当时范家也很穷，到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



范家父母忽然把她送到了火車上，賣給漢口一個人販子。不到一年，這個人販子又把她轉賣了一次。後來聽說又要轉賣給別人，她就逃跑了。從此，她就過着討米度日的生活。後來不久，在漢口碰上了姓趙的“叫化子”伯伯，他見她可憐，就收留做童養媳，她才正式有了個家。解放以後，全家生活得很幸福……。

分局領導和周少雲讀完這封信，一種強烈的階級同情心使他們久久不能平靜。他們仿佛親眼看到了四十多年前這姓何的一家，掙扎在死亡綫上，也好象同他一家老小正在經受着那生離死別痛苦的煎熬，更仿佛聽到趙宗德的母親在夢中呼喚親人的聲音。

“我們一定要幫助階級姐妹找到親人，而且越快越好。”分局領導堅定地說。接着他們又反復分析、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法：把目標轉移到市郊去，找“姓何（賀）”的“吹鼓手”。分局領導鼓勵老周說：“儘管她這次提供的新綫索很籠統，但是，任何蛛絲馬迹，對於我們公安人員來說，已經是寬敞的大道了。”最後，局長特別意味深長地启发老周：“我們要把階級姐妹的憂愁當作我們自己的憂愁，你自己過去不是也曾經經歷過悲離的痛苦嗎！……”

### 一根苦藤上結的瓜

當天晚上，老周百感交集，特別是局長最後的幾句話，真象針一樣刺到了他的痛處。他躺在床上翻來復去，辛酸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展現。

周少雲出身於一個貧農家里。在他出生後的一個月零七

天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死得很悲惨。当时，周少云的父亲在一个资本家家里做长工，得了急病，到快要死的时候，万恶的资本家不但见死不救，反而怕他死在他家里，就把病人拖到门外。就这样，周少云的父亲死在街边上了，死后还是用草席子包了埋的。到现在，周少云还不知道父亲埋在什么地方。父亲死了，母亲带着他到处讨米度日。他两岁的时候，母亲被迫改嫁了，从此他成了孤儿。十一岁那年，他跟着继父学木匠。有一年，附近一家姓黄的地主要周少云给他做棺材，周少云同地主顶了几句嘴，那地主便暴跳如雷，举手要打。周少云逃走了，可是那万恶的地主说：“在我黄家的天下面，看你逃到哪里去！”果然，不久的一天，周少云被那家伙揪住了，挨了狠狠的两扁担，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直到现在，周少云的头上还留下两条深深的伤疤）。然而，那地主并没有死心，又勾结伪保长，要抓周少云去当壮丁。老周被迫离开母亲，来到了长沙市一个资本家家里当木工。在这里，他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是几天几晚也说不完的……。

他想着想着，摸摸头上的伤疤，胸中燃起了一团团对旧社会仇恨的怒火。他不禁自言自语起来：“我不能松气，一定要帮助阶级姐妹找到亲人，我和她都是一根苦藤上结的瓜呀！”

### 毛主席著作的启示

第二天，老周就去郊区雨花亭、黑石渡一带查访。接着，又到长沙县的东山、干杉树等地查访。访问了几十个“吹鼓手”，都被否定了。但是，在这些访问的过程中，有好些老“吹鼓手”

热情地向他提供了許多綫索。这些綫索，伸展到了长沙市、株洲市的郊区和长沙、湘潭、浏阳等县的农村。他根据这些綫索，首先到了湘潭的易家湾和长沙市郊的暮云市查訪，都无結果。

轉眼間，已是一九六四年的春节。机关規定有三天假期。正当人們热热闹闹和家人团聚的时候，老周却騎着自行車又到长沙县的农村訪問去了。当时，狂风卷着雨雪，大地冰封。老周不顾这些，冒着风霜雨雪，跋山涉水，吃苦耐劳，踏遍了南托、石門、洞井、大托鋪、跳馬、团然等六个公社的王力坪、克家冲、木家坳等地方，訪問了許多姓何、姓賀的“吹鼓手”。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二月分又快完了，寻找工作已整整进行了四个月。随着時間的消逝，老周的心也一天一天地



紧张起来。啊，希望还是渺渺茫茫！这时，他产生了急躁情緒。他想：“这怕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地方訪問了那么多，‘吹鼓手’也訪問了不少的人，就是沒有找到我要找的人。”他急得心神不定，坐立不安。领导上看透了他的心思，說：“是不是工作真的做到家了呢？是不是真的已經山穷水尽了昵？你

不是經常說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如果你想半途而廢，這能算毛主席的好戰士嗎？”並且建議他再好好地讀讀毛主席的書。

深夜了，老周坐在燈光下，翻開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文章，一遍又一遍地讀着。毛主席說：“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热忱。……”毛主席又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讀着讀着，思想豁然開朗了。他想：“我是個共產黨員，為人民的利益工作作到了‘極端’負責任嗎？達到‘徹底’的標準了嗎？象我這樣半途而廢的思想，哪裏是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呢？……”

毛主席的指示，給了他巨大的力量。第二天，他又繼續開始了尋找工作。他跑到哪裏，就向哪裏的社員群眾作宣傳，哪裏的黨組織和社員群眾就向他伸出熱情支援之手。一天，他來到長沙縣團然公社訪問，公社黨委正在召開三級幹部大會。黨委書記知道老周的來意以後，很熱情地接待了他，並且在幹部大會上號召大家為尋找工作貢獻一分力量。晚上，老周拿了全社十多本戶口冊，把所有姓何、姓賀的“吹鼓手”名字都抄了下來，然後根據年齡等情況一一查對。有的當時被否定了，有的第二天由隊幹部帶領他一家家地查訪，也被否定了。又有一天，他在瀏陽縣柏加公社訪問，當離開老屋頭村，走了約兩里路的時候，後面追來了兩個小學生。他們邊追邊喊道：“同志，請你打轉來。我家來了個黃家大爺，有急事找你！”

老周急忙轉身來到老屋頭大屋，村子里站滿了社員群眾，其中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貧農老社員黃甫林——他住在附近的一個村子里，是聞訊特地趕來報告線索的——，激動地對老周說：“我過去有個吹喇叭的舅舅，家里很窮，生了四個女兒養不活，先後都送給別人去了。大女和二女現在住在長沙市郊左家塘和東屯渡，三女和四女現在還下落不明。三女是用土車子送到城里去的……。”老周非常感謝黃家大爺。於是，他的足跡又踏遍了長沙市郊的東屯渡、左家塘以及瀏陽縣的駱家沖，株洲市郊雲田公社的龍頭等地方。事情雖然沒有進展，但是，老周卻深深地為各地黨組織和社員群眾熱情的支持所感動。

### 三家認親

冬去春來，這時已經是三月底了，尋找工作開展了整整五個月了。也就是在這幾個月當中，許多地方的社員群眾都把周少雲幫別人找親人的事情傳開了。因此，有許多人前來向分局提供情況和報告線索。這裡出現了三家認親的故事。

第一家是長沙縣大托公社大托大隊貧農社員賀澍明。他來到分局要認親，說他有一個姑母是祖父用土車子送到長沙城里去的，一直到現在還下落不明。幾十年來，祖母都哭着那送走了的女兒。特別是賀澍明的在株洲某工廠工作的妹妹，聞訊後特地請假趕來分局，硬說趙宗德的母親是她的姑母，要求分局去信要姑母回來見面。她還說：“如果她不是我姑母，那也不要緊，天下窮人是一家，她來了，我家決不會輕待她。”

第二家前來認親的是瀏陽縣柏加公社何園大隊貧農社員

何运兴。他說：“我祖父叫何受福，是个‘吹鼓手’，过去家里穷，后来又被盜过一次。就在被盜的第三天清早太阳沒出山的时候，祖父用土車子把自己的女儿推到长沙城里送給別人去了。听說你們在帮助一个姓赵的寻找亲人，那肯定是我的姑母了……。”

第三家認亲的是株洲市郊区龙头鋪公社太平大队貧农女社員何桂元。她来信說：“我父亲名何晓庭，年七十四岁（已死），母亲何文氏（已死），生有六女二崽。原住株洲市郊中西塘灣（离长沙八十多里），住的是一栋人字形的烂茅屋，屋后有山，到秋天山上有毛栗子摘。过去我家很穷，父亲曾經是个‘吹鼓手’。有一年約在五月間一个晚上，家中被盜得精光。过了两天，父亲用土車子推着我一个七八岁的蓮姐姐（她排行第三，記不清名字了），送到长沙市南門一家人家去了。也就在这一年，我母亲被迫到长沙一个資本家家里喂奶汁去了。一九五八年母亲临死时，还口口声声喊：‘蓮妹子，你在哪里？’……。”

与此同时，太平大队党支部也来了一封信，詳細介紹了何晓庭过去家中的情况和送女一事的細节，并且随信寄来了何文氏和她的二女何秀英的两张照片，要求公安部門查証。

奇怪呀奇怪，这三家的情况竟然如此相同，找亲人的心如此迫切。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穷人的命运是相同的，多少父母忍痛卖儿送女是迫不得已的啊！分局领导和周少云認真地分析研究了这三家的情况。最后，分局领导指示周少云：集中精力对这三家进行調查。周少云根据这个指示，首先訪問了长沙县的賀澍明家和浏阳县的何运兴家。經

过深入調查了解,反复分析,这两条疑綫被否定了。最后,老周又到株洲市郊何桂元家訪問,还一个一个地訪問了何桂元的姐姐和妹妹們。她(他)們所談的情况,都同何桂元以及大队党支部介紹的一个样,也与赵宗德的母亲来信所提供的情况完全相符,并且了解到这被送走的三女儿“蓮姐”叫何蓮真。老周又把赵宗德的母亲寄来的照片,同何桂元姐妹弟弟們一个个地对照,几乎都是一模一样。这时,老周是多么地高兴哪!經過半年多来的查訪,总算弄到个水落石出了!但是,說也奇怪,他的心情又突然紧张起来:

“万一范长珥不是何蓮真,那……”老周迫切地要作出最后的結論,从株洲直奔何桂元的哥哥何玉华家。何玉华是何蓮真的弟弟(排行第四),現在长沙市郊区手工业联社自力紅砖生产合作社当技师,已經有五十三岁了。老周来到他家,他們談了很久,从他家的



情况談到老何的工作,从現在的生活談到解放前的日子。在閑談中,老周反复証實了湖北的范长珥确是他的姐姐了。最后,

老周从身上取出范长珥的照片給何玉华看。他看着看着，忽然热泪盈眶地說：“这，这就是我的蓮姐！”

## 团 圓

分局立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赵宗德。端午节前夕，赵宗德陪同他母亲从湖北沔阳来到了长沙市。母子俩一下火車，就赶到西区公安分局来道謝。端午节的这一天，何蓮真和赵宗德坐在分局的接待室里，何玉华、何桂元听說姐姐回来了，急忙赶来相会。一进门，周少云对他們說：“这就是你們离别四十多年的姐姐——何蓮真。”一句话还没說完，玉华、桂元已經扑到了何蓮真的肩上，激动地喊着“蓮姐！”就放声痛哭起来。何蓮真叫了声：“弟弟！妹妹！”也是泪如雨下。姐姐、弟弟、妹妹拥抱着，千言万語一下子涌上心头，但又不知从何說起。

何桂元抬起头来，仔細地看了看姐姐的脸，又和姐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一会，她才掏出手帕替姐姐擦着眼泪，說：“姐姐，莫哭啦，我們不是团圓了么！”这时，何蓮真才对弟妹說出四十八年来的第一句話：“真沒想到能有今天哪！”何玉华說：“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哪能有今天！真得永远感謝共产党，永远感謝毛主席呀！”

赵宗德也跑过来和舅舅、姨媽見面。

泪，尽情地流吧！这是对旧社会的控訴，这是对新社会的热爱和感激！它表达着千言万語表达不尽的感情哪！

最后，当何蓮真离开分局到株洲去同其余的弟妹們团圓的时候，她（他）們紧握着分局领导同志和周少云同志的手，一



再感激地說：“十分感謝你們，感謝長沙市公安局西區分局的同志們！”

“這是黨和毛主席教導我們做的。”象每一次完成黨和人民群众交給他們的任務一樣，公安人員這樣回答。

（顏家龍插畫）

# 遺女尋親

沈良桂 劉 強

又一封尋找親人的信寄到了株洲市公安局。辦公室的負責同志把它交給了袁愛蘭同志處理。袁同志看過信，對來信人過去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解放以來，有過多少來信和來訪者，要求公安人員為他們尋找在舊社會失散的親屬哇！其中有許多人已經團圓歡聚了；但是，也有的人因為線索渺茫，無從查覓，至今不知生者是何人，親人在何方。不過，這封信令人鼓舞的，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只要找到“修鐘表的言榮福”，迷霧便可能撥開。

來信人是湘潭市紡織印染廠的一位女工，名叫喻淑媛。信里說：二十一年以前，在她三歲的時候，因為家里生活困難，父母忍痛割肉，把她送給了別人；後來，又由旁人轉薦，送給了湘潭市喻友昇做女。近年來，經過同志們的幫助，已經查明她原是株洲人。有一個叫言榮福的修鐘表的人，可能知道她同家人离散的情況。

根據信里提供的線索，袁愛蘭從幾十萬張人口卡片中，查到了言榮福現在建設大道鐘表門市部工作，就興高采烈地來

到了門市部。但是，言榮福說，他已經不記得有這回事了。

這就奇怪了！如果這一線索不可靠，事情就將變得複雜渺茫。也許因為年深月久，言榮福真的忘記了這件事！袁愛蘭耐心地启发他，希望他仔細地回忆回忆。

## 二

喻淑媛怎麼會斷定她的家是在株洲，而且肯定言榮福會知道她同親人离散的情況呢？這話說來就長了。

一九五〇年，解放以後過頭一個春節，淑媛高高兴兴地給祖父“拜年”，伯父不懂事的小女兒攔住她說：“這是我的公公（祖父），不是你的公公。你是撿來的。”十歲的淑媛，頭一次聽到這話，回到家里，便一頭撲倒在娘的懷里哭着問道：“媽，我真的不是你們生的嗎？”可是，父母親只是傷心地掉淚，勸她不要相信小孩子的話。

隨着年歲的增長，淑媛越來越想弄清自己的來歷。後來，她聽鄰居們說，她是她舅舅馮樹林抱來的。她幾次想去問舅舅，可是轉念一想，爸爸和媽媽把我當親生女兒撫養，還討飯喂養過我。解放以後，搭幫共產黨，我家翻了身，又送我上中學。黨和人民、爸爸和媽媽，都期望我將來為革命好好工作，我不能因自己的事影響學習呀！於是，她把這件事情暫時放了下來。

一九五八年，喻淑媛進了湘潭紡織印染廠當驗布工人。在黨的培養、教育下，她積極學習，忘我勞動，思想上、技術上，進步都很快。

有一次，厂里放映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淑媛看了，心如潮涌。她想，厂里许多姐妹，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已经象达吉一样，找到了在旧社会离散的亲人，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然而，她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在旧社会里把亲骨肉卖掉了，他们一定也是饱尝苦难的劳动人民！现在，他们是不是还在人世？如果他们还活着，也已经翻身出头了！他们也一定在思念着自己的女儿！她想着想着，禁不住抽泣起来。于是，她立即给舅舅写信，要求舅舅把她的来历告诉她，帮她寻找到亲人，并且一再表明：即使找到了亲生父母，也绝不会忘记把她抚养成人的、劳苦的喻家爹妈。可是，没有得到舅舅一纸答复。

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个礼拜天，厂里的女工张淑华邀喻淑媛到她弟弟张荣华那里去玩。张荣华在湘潭市清水塘一个国营工厂里工作，他热情地陪同她们游览。喻淑媛一到这里，便记起了一件事情：一九五四年，她曾经到过这个地方，那时，她舅舅冯树林就住在这里。她四处寻找舅舅的住址，渴望着从舅舅那里探到亲生父母的讯息。然而，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了。啊！时间只过了十年，一切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当年的茅舍荒坡，如今变成了烟囱林立的工业新区。

出于强烈的阶级同情，张荣华安慰了喻淑媛，要尽力帮助她找到她的舅舅。

分手以后，这位热心的青年工人便不辞劳苦，一下班就四下去探访冯树林的家。他找遍了清水塘，也没有人晓得冯树林这个人。但是，他没有灰心。他想起了自己家庭在解放以前的

遭遇；爸爸在长沙街头拉人力車，受尽了剝削和压迫，养不活一家老小；姐姐张淑华，几次差一点儿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嫂子，至今还没有找到亲生爹娘。他又想，毛主席教导我們：“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于是，他下定决心：即使踏破鉄鞋，也要帮助阶级姐妹找到亲人。他一連找了十来次，终于探听到喻淑媛的舅媽住在清水塘老街口，而她舅舅馮树林，早已經因年老去世了。

张荣华馬上写了一封信，把这些情况告訴喻淑媛。喻淑媛接到信以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专程来到了舅媽家里。但是，舅媽对她說：“淑媛哪，你的亲生父母到底是哪个，連你舅舅和我也不晓得啊；你开始是被人送給一个姓言的人的，姓言的不要，你舅舅才接过来。这姓言的叫言荣福，是在株洲修钟表的。”

喻淑媛根据舅媽談的情况，便立即向株洲市公安局写了前面講的那封信。

### 三

那天，言荣福在袁爱兰同志的启发下，回到家里，就問自己的爱人記不記得买女孩的事。他爱人叹了一口气，便談起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来：

那是二十一年前一个冬天的下午，有个衣衫单薄、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来到了株洲街上。当时，这位母亲含着滿眶眼泪，由建宁街胡甫成的妻子推荐，要求言家把这女孩收留下来。言荣福夫妇結婚还只有两年，考

慮往后自己有生育，沒有收養。在隔壁烟鋪里做工的馮樹林知道了，便把这小女孩收下了。馮樹林說，他有个姐姐住在湘潭，年近四十了，还没有儿女，他要把这孩子送给他姐姐去。天色漸晚，母女痛哭而別。在茫茫的夜幕中，在狂风的哀号里，远远还能听到这位母亲的嗚咽……

經爱人一提醒，言榮福怀着沉痛的心情，馬上去找胡甫成，了解这个女孩的亲生父母的姓名和住址。胡甫成听这一問，便伤心地告訴言榮福：他已經去世的前妻，曾經为她的侄外甥女婿湯其炳家里作介紹，把一个小女孩送給了人家。

言榮福問清了湯其炳現在住在白石港，第二天，便找到了湯家。

言榮福刚一說明來意，湯媽媽便悲喜交集地痛哭起來。二十多年前的痛心事，禁不住再現在这位母親的眼前：

一九四〇年，她生下三女兒秋蓮不久，丈夫湯其炳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抓壯丁，就逃到湖北去了。这个无田无地的赤貧之家，失去了唯一的依靠，怎么活下去呀？其炳嫂子只得忍心把不滿九岁的大兒子宗启送去給地主当小长工，自己牽着二女愛蓮、背着三女秋蓮沿門乞討，在那凄風苦雨之下，熬着岁月。其炳一去以后，一年复一年，竟杳无音訊。一些穷苦朋友有心帮助她們母女，但是无能为力，便相劝道：“嫂子，还是找个主，把孩子送給人家吧！”自己身上的肉，怎能忍心丢掉！然而，在那不見天日的旧社会里，她又有什么办法呢？眼下就是寒冬，可怜的孩子啊，不餓死也得冻死！就在这走投无路的当儿，她忍痛割下了亲生骨肉，由胡甫成的前妻領着，把三岁多

的秋蓮送給了人家。自从母女生离以后，做母亲的从来没有干过眼泪呀！一听到别人的孩子喊媽，她的心里就发慌，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今天，事隔二十一年了，竟意外地得知秋蓮的下落，她的心哪！怎么能够平静！

#### 四

株洲市公安局把一切情况証实以后，便組織湯媽媽一家作幸福的会見。昨天，湯媽媽的大儿子湯宗后，已經到了湘潭紡織印染厂。今天，湯媽媽同二女和滿女，也坐上了开往湘潭的列車。这位五十二岁飽經患难的母亲，坐在車上，真是又高兴又紧张。她猜想着秋蓮的模样，是不是也象她的姐姐、妹妹；她亟需知道自己这亲生骨肉，这些年来究竟是怎样长大的，又是怎样讀的书，进了国营工厂。她有滿肚子的話，要告訴即将重逢的女儿；告訴她，爹娘为什么养她不起；告訴她，解放以后苦尽甜来的翻身譜；告訴她，父亲躲壮丁出去以后受尽了人間苦难，几乎被旧社会折磨而死，而如今虽然年近“花甲”，但是精神健旺，在帆船合作社里工作，度着幸福的晚年；告訴她，过去給地主做牛馬的大哥宗后，現在成了一个五級鍋炉工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同样受过熬煎的爱蓮姐姐，如今也有了劳动、美好的家庭；还有她那沒有見過面的弟弟和妹妹，都正在念初中……。湯媽媽想着想着，濺起了激动的泪花。

上午十点半钟，她們到了湘潭紡織印染厂。

“媽媽，你老人家来了！”淑媛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亲

热地迎了上来。

媽媽微微地应了一声，便喉嚨哽塞，热泪双流，什么也說不出来了。啊！眼前这个身体健壮、面頰丰腴的女工，难道就是当年跟娘一起沿門哀飢、露檐号寒的苦妹子嗎？是的，你看她那眉宇，那眼神，多象她的姐姐；还有，那颗小黑痣还长在右下巴上哩……

淑媛把媽媽領进了宿舍，顿时轟动了整个大楼。淑媛的房間里，被挤得水洩不通。姐妹們是那么地高兴，都在为自己的阶级姐妹能同亲人团聚而由衷地祝賀。当她們听到湯媽媽訴說母女离别的情景的时候，她們无不伤心地垂下泪来，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



# 兄 妹 悲 欢

王正湘

湘潭县青山桥公社青山桥大队貧农唐德富，藏着一张他和妹妹在县委党校重逢时的合影。他常对人說：“这张照片不平常，它深刻地傾訴了我在旧社会的辛酸和在新社会的幸福！”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德富在中共湘潭县委党校学习。在一次訴苦会上，他怀着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一字一泪地向大家訴說了自己在解放前的遭遇。

一九三三年，德富十一岁的时候，爸爸在湘潭县城帮資本家織布，媽媽带着他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刚生下的妹妹，住在湘潭县广陵桥老家。家里沒有半片地，一家人半飢半飽地过日子。

一九三四年，家乡发生大旱灾，大部分田地禾苗枯焦，顆粒无收。地主、奸商乘机囤积居奇，一时米价暴涨。許多农民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真是飢民成群，餓殍遍野；德富媽媽带着几个孩子，风里来，雨里去，东家乞，西家討，还是混不了口。一天，媽媽把骨瘦如柴的孩子們叫到跟前，伤心地說：“伢子，你們生在这个鬼世界里，做爹娘的真养不起你們啦；不是娘忍心

……”她說到这里，怎么也說不下去了，眼淚禁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來。德富和姐弟三個，也傷心地痛哭不止。最後，媽媽強忍着淚，把年僅十四歲的姐姐送給別人做了童養媳，把弟弟寄到了外婆家裏，帶着德富和妹妹逃荒去了。

母子三人一路行乞，好容易走了百多里路，來到了湘潭縣城。媽媽心想：这下好了，城裏不會象鄉下那樣鬧飢荒，找到孩子他爹，生活就有着落了。可是，事與願違，縣城並不比鄉下景氣，市面蕭條，工廠和商店紛紛倒閉，孩子他爹早就失業，到別地謀生去了！媽媽帶着孩子找遍大小織布廠，也不見爸爸的踪影。怎麼活下去呀？她只得給人家洗衣服，掙幾個零錢，並且把這點錢买点糖果，要德富用籃子提着到輪船碼頭去叫賣。這樣，孩子們還常是餓得哇哇地叫。生活的重擔壓得媽媽喘不過氣來，她想：不能眼睜睜地看着孩子們餓死啊！她心一橫，咬緊牙關，就把不到一歲的小女兒送給了一家姓劉的人家。

儘管德富當時還只有十二歲，事隔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但是送妹妹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那是一個淒風苦雨的黃昏。媽媽深陷的眼眶裏，滿含着眼淚。她把妹妹抱在懷裏，喂了奶，在妹妹圓圓的小臉上親了又親，哽咽着說：“心肝哪！為娘的養不起你，送你到別人家去過日子吧！”說着，淚珠象牽綫似地沿着兩頰流到妹妹黃黃的小臉上。妹妹似乎也懂得媽媽的心意，眨了几下眼睛，小嘴一動，“哇！”的一聲也哭了。媽媽哭成了泪人兒，抱着妹妹向劉家走去，步子象有千斤重。德富跟在後面，扯着媽媽的衣角大哭：“我要妹妹呀！我要妹妹呀！”媽媽長嘆一聲，撫摸着德富的頭

說：“伢子，莫怪媽心腸狠，是這世道逼的呀！等日後日子好過一點，再把妹妹接回來吧！”

這一晚，寒風敲打着門窗，媽媽在床上翻來復去，抽抽噎噎，直到天明。德富也未曾合眼，心想，幾天以內，一家人就被逼得四分五散，我們窮人要苦到什麼時候啊？！他陪着媽媽流了許多眼淚。這是他一生永遠難忘的一個夜晚，一想起就心碎的一個夜晚哪！

一九三五年，母子倆為了生活，離開縣城，到了省城長沙。他們東訪西問，仍然得不到爸爸的消息。媽媽又只得到一個賭痞家做女工，把德富送到一家篾匠店裡當學徒。

賭痞的名字，德富已經記不起了。他只記得他家很有錢，開着賭場，經常聚集一些賭棍賭到深夜。媽媽在他家做工，起早睡晚，大小活都得干，如同做牛馬一般。

不久，不幸的事又發生了！

一天，德富正在店裡干活，忽然，他的一個堂姑母（她在那賭痞的鄰家做女工）氣喘吁吁地跑進來說：“德富，快去！你媽……跌……跌死了！”德富象巨雷轟頂，耳朵里“嗡！”了一聲，就倒在地上，悲慟欲絕。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這天，德富媽正在晒樓上晾衣服，賭痞大搖大擺地從外面回來，朝着她神氣地喊道：“泡茶來！”她說：“好，晾了這件衣服就來。”賭痞嫌她動作慢了，氣勢汹汹地大罵起來：“端了老子的碗，就得服老子管！你這窮鬼，真不識抬舉。哼！莫怪老子……”德富媽又急又氣，一失足，就從高高的晒樓上跌下來，頓時慘叫一聲，腦漿迸裂，傷重致死。

德富跟着姑媽來到賭痞家，見媽媽的屍體倒在天井里，血肉模糊，鮮血把地面染紅了一大片。他心如刀割，一把抱住屍體大哭：“媽呀！媽呀！”賭痞一見，凶眼圓睜，臉上的橫肉顫動，狠狠地把德富踢了一腳，呲牙咧嘴地喝道：“小雜種！哭什麼！還不快点把她埋了！躺在这里討厭！”

德富恨不得狠狠地打他几拳，咬他几口。但是一想，自己是一個孤單單的窮孩子，怎麼拗得過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只好忍氣吞聲。

媽媽的工資被賭痞吞沒了，十三歲的德富有什麼辦法埋葬媽媽呢？後來，多虧街坊上一些窮苦人的幫助，湊了一點錢，才把媽媽草草地埋葬了。

從此，他只身單影地在篾店裡繼續學徒。他每天起早睡晚地干活，還時常挨打受罵。他被折磨得面黃肌瘦，只剩下一副皮包骨了。

在這些日子裡，他是多麼想念自己的親人哪！一想到媽，他耳邊就好象響起了媽平時對他慈愛的呼喚聲，眼前就仿佛呈現了媽那被人害死的慘狀，心裡就象針扎似的。爸爸呢？沒有訊息，是否還在人間？姐姐和弟弟遠在幾百里以外，他們怎麼樣了？送給了別家的滿妹，千萬不要象我當學徒這樣受苦受難啊！什麼時候，才能象媽所說的把滿妹接回來呢？要是有一天一家人團聚在一起，該是多麼好哇！

然而，在萬惡的舊社會裡，要被逼得四分五散的親人團聚，談何容易！不知有多少次，德富在湘江邊徘徊，盼望自己的親人！盼哪盼哪，眼睛都盼穿了，伴着他的，却總是湘江流水

的嗚咽！

德富学徒出师以后，就给人家干零活，生活总算勉强可以混下去了。然而，在旧社会里，穷人是不会有什太平日子过的。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发动内战，大抓壮丁，把德富也抓去了。

德富在反动部队里，熬了两年多。霹靂一声春雷动，一九四八年，开封解放了，他终于得到了翻身。从此，他参加了自己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打天下。在党的教育下，他提高了阶级觉悟。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〇年参加抗美援朝战斗，他先后立过三次功。一九五五年，他复员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当了民兵中队长。这时，离散多年的父亲和弟弟，早已经回到家乡团聚。一九五六年，德富结了婚。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他一家人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新旧社会对比，德富深深感到新社会无比温暖、幸福，那颗心哪，就象浸在蜜糖缸里似的。只是有一个心愿，还没有了却——满妹没有讯息，不知道她的情况怎样！还能和她团聚吗？他是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和妹妹团聚呀！

全场的同志，听了唐德富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都悲愤填膺，有的还情不自禁地掉下了泪来。在座有一位留短头发的女同志，年纪二十多岁，名叫张明英。她泪水盈眶，久久地凝视着德富，心里似乎产生了疑团，嘴唇动了动，忍不住要说什么，好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去。突然，她一个箭步，走到德富

跟前，激动地说：“你是一九三四年大旱灾的时候离开老家的，我也是那个时候离开老家的；你妈妈跌死在晒楼下，听说我亲娘也是从高楼上跌下来跌死的；你有满妹没有音讯，我也有亲哥流落在外头。真是猪胆、黄连一样的苦哇！”



唐德富一下怔住了，对着张明英瞧了又瞧，心里敲起了小鼓：她的相貌多么象妈妈呀！她谈的情况和我的一样，莫非她就是我的满妹！

张明英接着说：“我早知道自己不姓张，是姓唐，老家在几十里以外的青山下。好几回去打听亲人的音讯，都失望了。我望着青山，不晓得流过多少眼泪；我做梦也时常梦见爸爸、妈妈和哥哥啊！”

两人详细地交换了情况，果然，一丝不差，张明英正是唐

德富的滿妹！原来，一九三四年，媽媽不得已把她送給刘家以后，刘家养不起她，不久，又把她轉送給一家姓张的了。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侵占了湘潭县城，张家一家人逃难到几十里以外的錦石，在农村住了下来。张家生活也貧困，明英十五岁的时候，便給人家做童养媳，受尽了虐待。解放以后，她才脫离了苦海。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她提高了觉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讀完了中学。

离散二十四年的兄妹重逢了！顿时，两人悲喜交集，手拉着手，相对垂泪；不一会，又笑逐顏开，心头甜滋滋的。

报社記者聞訊赶到，进行采访，为兄妹俩摄影留念。

同志們为兄妹俩的团聚感到无比兴奋、激动，并且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們說：兄妹俩从离散到团聚，这本身就是一堂最生动最深刻的政治課！新旧社会对比，硬是两重天哪！

这时，会場中响起了唐德富坚定宏亮的声音：“同志們，翻身莫忘血泪仇！翻身莫忘党的恩！我要永远听党的話，永远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

明英望着德富，一字一板地說：“哥哥，你真說出了我心坎里的話呀！”

顿时，全場响起了一阵春雷般的掌声。不用說，在座的每个人，特别是兄妹俩，誰都深深地懂得这陣掌声的意义！

（馮宝誠插画）

# 母子團圓記

聶 海

## 一

山喜鵲喳喳地叫，蟬兒奏着歡樂的歌，好象在預告着，一件什麼喜事就要到來了。中午，汽笛長吼一聲，一列火車慢慢地駛進了五里墩車站。在從車上下來的人群中，有一位高高的老媽媽。她操着湖北口音，向人們打聽一個名叫王秀清的人。一個鐵路工人打扮的中年男子，跑到老媽媽面前，抓着她的手，顫抖着聲音喊了一聲：“娘！”老媽媽把這個魁梧的工人端詳了半天，才哽咽地叫道：“我的清兒！”兩行熱淚，禁不住奪眶而出。母子淚眼相對，一時再也說不出話來……

這件母子離散二十八年，在新社會重獲團圓的喜事，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的一天。人們祝賀着扳道工人王秀清和他母親團圓，也紛紛傳說着他母子悲歡離合的故事。

## 二

一九二七年，王秀清三歲的時候，他父親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坐牢，活活地被折磨死了。從這以後，靠父親剃頭賺錢糊口的秀清一家，被迫走上了乞討度日的悲慘道路。



他們历尽千难万苦，熬过了三个年头。然而，就在秀清六岁的时候，他的家乡——湖北枣阳县遇上了灾荒。暴政加灾年，討飯的越来越多，要在当地討飯过日子，再也不行了。他們一家，不得不加入源源的难民队伍，离乡背井，远走他方。这年冬天，他同祖母和母亲，流浪到了湖北和四川交界的宜昌地区的大山区里。为了得到一口残羹剩飯，他們决定分成两路行乞：他母亲走得快，一个人走一个方向；他和祖母，另走一个方向。

一个阴霾的冬日，大雪覆盖着丛山峻岭，豺狼的嚎叫声在山谷里回蕩，世界变得更加险恶冷酷了。就在这天，秀清娘一去再也沒有回来，秀清哭着要娘，奶奶总說：“娘要飯去了，会帶回白饑饑来給你吃。好孩子，莫哭，乖……”說着說着，她自己反而流出了伤心的老泪……

### 三

秀清娘自从那天出来以后，迷失了路，差点冻死在雪地里。以后，她虽然几乎找遍了整个山区，但是再也沒有看見年幼的儿子和年老的婆婆。她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不知道在梦里和儿子、婆婆会了多少次面！后来她想，在那人吃人的世界上，多少年青力壮的人都被冻餓死了，他們祖孙更可能早就不在世了！就这样，她满怀悲愤，孤身只影，在外漂泊了二十年。

解放以后，一九五〇年初，秀清娘来到了湖北随县。随县人民政府十分关心她的疾苦，把她送回了故乡。枣阳县人民政府热情地接待了她，分給她三間大瓦屋，七亩半地，还和另

一戶合分了一頭耕牛。共產黨給了这个乞討將近半生的婦女以幸福的晚年，还告訴她一个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喜訊：她的儿子还活着，并且成了解放軍战士；她觉得自己是从地獄进入了天堂，深深懂得毛主席和共產黨是劳动人民的救命恩人。只是和儿子离散的痛苦还在纏繞着她，她多么希望見到儿子；人民政府也曾四处幫她打听，但是没有得到消息。

#### 四

原来，王秀清在和他娘离散以后的第二年春天，就跟着奶奶回到了故乡。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沿門乞討，闖过了一个又一个死亡的关口。白发蒼蒼的老奶奶，把孙子拉扯到十岁的时候，终于因为貧病交迫，死在一个秋风秋雨的黑夜里了。秀清討飯、打短工，好不容易才混到了一九四七年。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刻，一声春雷，来了共產黨。二十三岁的秀清，扔掉了討飯籃，接过了共產黨給他的槍，参加了游击队，以后，又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秀清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导下，逐漸成长了起来。他轉战南北，在祖国、在朝鮮，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一九五〇年，他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冬天，他帶着征尘轉业来到鐵路工作。他不忘过去苦，长思今日甜，立場坚定，工作勤恳，多次被評为站、段和分局的模范。他考虑到家里已經没有任何亲人，因此一直沒有給家乡写信。

一九五五年冬天，王秀清到五里墩車站工作以后，因为思念家乡的階級兄弟，便給他們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多年来的

工作。出乎他意料之外，回信中說：他失散多年的母亲回到了家乡，并且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愉快地过着晚年生活。他接到这封信以后，激动得整夜沒有睡着觉。啊，是共产党救出了他們母子，他怎能不感激得流泪！母子已經离散二十多年，他怎么不想立刻飞到娘的身旁！可是，站內工作忙，他不愿离开自己的崗位，影响党的工作，一直沒有請假去探亲，也沒有把这个消息告訴別人。最后，他写了一封信，請娘到五里墩来。

就这样，秀清娘在一九五八年来到了五里墩車站。她看着健壮的儿子、能干的媳妇、两个可爱的小孙子……，她想起旧社会的苦难，她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于是，她轉向挂在房中央的毛主席像，投过了深深的感激的目光。

# 五 姓 兄 弟

邓 璞

正是晚稻登場，菊花飄香的季节，我到了南县沙港市公社新安大队第八生产队。队上正在赶着送公粮，渠道里划子连着划子，象一条金龙似的。听说这个队的公粮，只花了三天工夫就送得差不多了，今天送的是最后的“尾巴”。社员们送公粮的劲头这么大，真使我感动。这天晚上，我跟队长曾凤庭闲谈，扯到了这件事。曾队长说：“我们身在福中，怎能忘记过去的苦，忘记国家哩！我们这个垅子，解放以前叫德福垅，又叫‘呵嘴垅子’，大水一来，一声‘呵嘴’就倒了。听老辈子说，从‘民国’二十年到‘民国’三十八年，这垅子就倒了十三次。堤倒垅溃，劳苦农民受的苦难真是说不尽哪！我们队里三十六户，那时就有三十一户经常在外讨米、逃荒。饿死、淹死、吊死的人，有好几十个！”

他喘了一口气，接着说下去，越说越激动：“如今呢，搭帮毛主席，堤垅整修好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今年得了丰收，我们的生活更好，怎么能忘了国家呢！就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是丰衣足食；可是，解放以前，受尽了穷，受够了苦，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我家五兄弟竟落到了五个姓哪！”

他停了停，接着说：“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啦：‘民国’二十

八年五月，正是早稻成熟的時候，一聲‘呵喲！’我們這個垵子倒了！到處雞飛狗叫，呼爹喚娘。那天夜里，風雨大作，我們一家人撐起一鋪晒簞，抱着幾根木頭，蹲在一個高坡上。爹爹和媽媽，半截身子浸在水里。我從來沒有看見爹爹哭過，可是那時，他的眼里也含着淚水。怎麼不傷心呢？一担皮籬，從老家寧鄉落腳到這裡，好不容易才佃了一塊地；他斬草開荒，磨沙啃泥，實指望能興個家，立個業，可是，一場大水，連鍋碗瓢勺都被沖走了，而且還欠下地主聶玉階一石三斗谷的債。

“媽媽也是一個苦水里泡大的人。她只有八歲，就到李家做童養媳了。在李家，她生了我大哥。沒有好久，大哥的父親給地主做長工活活地累死了，媽媽便帶着大哥改嫁到我爹爹周長生這裡。媽媽嫁到周家以後，又生了我們兄弟四人。在平日，由於地主剝削重，我們家吃飯的人多，做事的人少，日子已經過得很艱難。如今大水一洗，這個日子就更沒法過了！”

“水，越來越大。那一夜呀，我們一家人，伴着風，伴着雨，哭成了一堆。

“第二天，垵子里瀆滿了水。房屋沒有了，樹木沒有了，四方八面一片白。在一條小小的堤上，擠滿了人。人們這時雖然停止了哭叫，但是心里更急更痛，望着這一片汪洋大海，都在想着：今後怎麼活哇！”

“忽然，一個胖得象豬樣的人，坐着一隻小划子，來到了我家臨時搭的棚子旁邊。這是地主聶玉階。這家伙做事狠毒，四鄉八里的人都背地里叫他做‘土皮蛇’。他沖着我爹爹吼道：‘長生，垵子也倒了，你們跑的要跑，逃的要逃，我這點谷，有還



沒有还?!”爹爹听着,脸都气白了。他本来想大罵这家伙一顿:‘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几十户人家交的修堤費,你塞了腰包,如今堤倒坑潰,你还要来逼債……’但是,在那号世道,地主家有錢有势,他哪能容你罵他!于是,只好說道:‘鏟子都沒动,你看我把什么东西还哪!’

“‘实在沒有嘛!那好說,那就照前天楊紹时跟你講定的办。’

“前天,我爹爹正在田里做工夫,地主楊紹时走来,把他喊上岸,逼着他把我四哥冬保卖给聶玉阶抵債。我爹爹牙齿咬得鉄紧石严,沒有做一句声。当天晚上,我爹爹唉声叹气,一整夜沒有睡。媽媽也伏在床边,嗚嗚咽咽地哭。爹爹劝她:‘哭什么,只要坑子不倒,我就是脑壳倒轉做脚走,也不能糟蹋崽女!’

“想不到只隔得一天,坑子就倒了!聶玉阶这个吃人魔王竟逼上了門。爹爹心想,拖起这么大小六七个,眼下粒米不存,

橫豎會活活餓死。於是，心一橫，對地主說：‘你要怎樣就怎樣吧！’

“就這樣，我四哥被抵了一石三斗谷的債。跟地主姓‘聶’了。

“四哥被逼賣掉了，我們剩下的幾個，便靠爹爹放釣維生。媽媽常常為爹爹在外面受風吹浪打操心，流眼淚。爹爹總是安慰她說：‘苦一點沒什麼，只要能度過冬天就好了！’

“誰曉得冬天還沒有過去，大禍又臨頭了！

“一天早晨，媽媽剛剛從床上爬起來，喊道：‘哎哟！好大的雪哩！’接着，她象是對我們兄弟說，又象是自言自語：‘唉！不曉得你爹爹昨夜里打到魚沒有。’

“我們跟着起了床。媽媽燒一把草給我們沖了寒，把紅灰夾到灶里。刷完鍋，便等爹爹帶米回來煮。那時，爹爹是夜里打魚，早晨就提到青樹咀街上去賣；賣了，就買米回來。

“等啊，等啊，眼看太陽從水里爬出來了，照到棚子邊了，照到我們睡覺的門板上了，還不見爹爹的影子。媽媽見我們幾個餓得哇哇哭，先炒了一點野菜給我們吃。吃完，就抱着我，牽着另外幾個，站到棚子外面去望爹爹。

“快到中午了，還是不見爹爹回來。媽媽邀着幾個鄰居，就到湖里去尋。七尋八尋，天哪！爹爹硬梆梆地凍死在湖里了！手還緊緊地抓着船邊。原來，他的釣鉤被淹在水底的房屋挂住了，他余進冰水里去取，又冷又餓，再也沒有爬上船來！

“爹爹死了，媽媽喉嚨都哭啞了，眼睛也變得痴痴呆呆了。她抱着爹爹的屍體，暈了過去……

“穷苦的邻居們把我爹爹从水里捞上来，抬到了我家的棚子里。可是米沒一升，板子沒一块，怎么埋葬爹爹呀！媽媽失了主张，坐着一动也不动。我們几兄弟也只曉得哭的哭，喊的喊。邻居的穷朋友們看着我家这副凄凄惨惨的情景，也都掉下了眼泪。后来，有的出板子，有的出米，好不容易才把我爹爹掩埋。

“有个名叫曾桂譜的，也是一个受苦人。他看着我媽媽拖着这一串小孩，无依无靠，不忍我們几兄弟活活餓死，就宁愿自己喝粥嚙糠多受一点苦，把我带到了身边。他还从自己屋里匀了一点谷給我媽媽。于是，我便跟养父姓‘曾’了。

“我到养父家里的时候，还只有五岁。曾家对我象对待自己的亲骨肉，从来沒有分过二样。可是，外面有錢有势的人就不同了，說我是‘樹丫里結的’，是‘野家伙’。有一次，地主萧帮理的‘宝贝’儿子，逼着把我当馬騎，还拿着馬鞭子打我，要我快点爬。我恨不过，把这小畜牲从背上掀了下来。地主婆冲出門来，狠狠地打了我两耳光，还罵道：‘小杂种，你不讓他騎着好好耍，老娘掀掉你的脑壳！’那时候，我真不懂解，为什么同是人，我却这样地受尽百般侮辱！遇上这些事的时候，我就哭媽媽，想媽媽……

“苦难的媽媽怎么样了呢？后来听說她被地主逼得跳水自杀，被人救上岸以后，不久就得病死了。她死的时候，家里一点东西也沒有了。为了埋葬媽媽，邻居們作主，把二哥卖給了一个姓石的人家。从那以后，他就姓‘石’了。

“媽媽死了以后，剩下的大哥和三哥年紀都还小，无法生活下去。邻居們也只好托人把他們送給地主看牛。大哥仍然姓



李，三哥仍然姓周。

“我們一家七口，就这样死的死，散的散了！爹爹死了，媽媽死了，我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但是，我們兄弟五个，几时才能够团聚呀！”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一声春雷动，铁树开了花。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了！解放不久，党就帮助我找到了几个哥哥的下落。如今，我大哥和三哥都在大通湖农场。二哥在本公社青树咀大队。四哥在本公社福利堂大队。我們五兄弟五个姓：大哥姓李，二哥姓石，三哥姓周，四哥姓聶（現在他已經恢复姓周），我姓曾。这五个姓，記下了我一家在旧社会里的悲惨遭遇。

“現在，我們五兄弟，和所有的穷苦农民一样，都翻了身，成了家，立了业。在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的大家庭里，过着热和和的日子。

“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們五兄弟在一起会面了。五兄弟見了面，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千言万語說不尽我們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訴不完我們对旧社会的痛恨！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貧下中农，听到我們兄弟团聚的喜訊，都赶来給我們祝賀。我們兄弟一致向他們表示：永远不忘階級苦，永远听毛主席的話，跟共产党走！”

（周令謨插画）

# 三个母亲的故事

叶文祥

## 一张喜报

驻省某部队四好单位和五好战士授奖大会开过以后，一连的战士们有说有笑地围着与会代表，听他们讲大会的情况。可是，奇怪，一向活跃通讯员小汤却不象往常那样有说有笑了。他独个儿坐在一边，拿着一张五好战士喜报，不声不响地在出神。

小汤名叫汤石林，一九六二年入伍以来，连续两年都获得了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今年——一九六四年，还出席了团部的授奖大会。那么，为什么他又如此心事重重呢？原来他得了一张喜报，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寄好。是小汤没有家吗？不是！要说清



这內中的情由，还有一段曲折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哩：

## 媽 媽

一九五四年秋天，十岁的湯石林正在益阳市东門口小学讀書。一天，老师把他叫到房里，指着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向他說：“小湯，这是你的媽媽蕭玉梅，特地来看你的。”

“媽媽？！”小湯不觉惊呆了：媽媽杜友秀不是在家里嗎？怎么又来了一个媽媽呢？

蕭玉梅拿出糖果給湯石林吃，亲热地說：“孩子，不要奇怪，多亏党和政府帮助，媽媽才找到了你！”

小湯仍然很拘束，不敢認。

这天放学回到家里，小湯在两个媽媽面前，不知如何是好。媽媽杜友秀向他解释說：“我不是生你的媽媽，她才是你的亲媽媽。孩子，还不快叫媽媽一声！”接着，父亲湯照桂和媽媽蕭玉梅向他講述了一段伤心的往事：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了。他們一家人住在益阳县新桥河地方。这年，日本侵略軍来到了益阳，杀人放火，奸淫擄搶，逼得人們四出逃难。湯照桂背着石林，蕭玉梅拿着衣物，跟随着人群沒命地逃跑。当脫离了危險的时候，湯照桂才发现蕭玉梅已經不見了。他四处打听蕭玉梅的下落，可是一直沒有找到。家，已經沒有了，他只好带着孩子，来到益阳城里謀生。蕭玉梅自从与丈夫冲散以后，一个人不知往哪里走好，哭天不应，呼地无声，踉踉蹌蹌順着乡下的新路走去。在路上，她遇着她丈夫的一个穷朋友。这位热心的朋友不仅供給她的生活費用，还

介紹她給人家做女工。蕭玉梅時常想起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可是一無路費，二無熟人，也打聽不到丈夫和兒子的下落。後來，有一個同鄉從漢口來探親，談到漢口有人要找女工，蕭玉梅便又隨那人去到了漢口謀生。解放以後，她和一个工人結了婚，但还是經常想念小石林，經過多方了解，才得知兒子在益陽市上了小學。

蕭玉梅談着往事，悲喜交集地說：“要不是解放，媽媽這一輩子也見不到你了！”

小石林眼淚簌簌地流了滿臉，一頭倒在媽媽的懷里……

### 奇怪的挂號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一天，連里收到一封從安化寄給湯國良的挂號信。通訊員湯石林拿着這封信奇怪地說：“我們連沒有叫湯國良的呀！”他以為是調走了的老同志，自己不認識，便去問文書。文書看了看信封說：“我們連沒有這個人，安化入伍的除了一個姓黃的同志以外，再也沒有了。”

“看誰可能有两个名字？”不知誰這麼說了一句。

小湯忽然想起了什麼，慢吞吞地說：“我小的時候，好象叫過這個名字，現在連我自己都忘記了，還有什麼人會知道？再說，我在安化又沒有親人。”

大家認為這是湯石林的信，要他拆開來看看。小湯把信拆開一看，更覺得奇怪，信中寫的是找兒子湯國良。他越發相信這不是自己的信了，心想自己親生母親已經找到，哪里還有什麼親生父母？

小湯把信繼續讀下去，越讀越不解，信中所說湯國良的年齡、讀書的學校、漢口母親的名字，又都和他自己的情況相同。湯石林不知如何是好，這時，連長給他出了個主意：既然是認子，回信叫他們把親人的照片寄來對一下，看看象不象。

沒過半月，果然寄來了兩張照片，說是哥哥和妹妹的。大家把相片一看，都拍起手來，嗚！哥哥的相和小湯象極了，就好象一對雙胞胎一樣！

於是，領導上決定批准小湯十天假，叫他回去認親。

## 尋 兒

原來，小湯本名吳僅明，出生在安化縣吳家沖的一戶貧農家里。一九四四年，安化遭受了大旱災，他的父親吳明初被迫帶着一家老小，從安化逃荒到桃江縣馬迹塘，希望憑着自己的石工手藝混一口飯吃。可是在舊社會里，到處都沒有窮人的活路。吳明初的父母年老多病，他三個孩子都很小，在那樣的年頭里，一月做不上幾天工夫，每天野菜煮稀飯，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還混不下去。眼看一家人實在熬不下去了，吳明初只好含着眼淚，忍痛把不到九歲的女兒送給人家做童養媳，把才出生不久的小兒子吳僅明送給了一個過路的小販湯照桂。

解放以後，日子一天天好起來。吳明初的妻子蕭芝蘭，怎么也忘不了過去的苦難。她不止一次地催促丈夫找兒子。老吳听了，總是一句老話：“分別這麼多年了，哪里去找哇！”

一九六三年四月間，吳明初從安化去桃江，順便打听兒子的下落。在和熟人的閑談中，偶然聽說兒子現在益陽市讀書，

儿子的养母萧玉梅住在汉口大夹街八十号。老吳听了，心里十分高兴，回家和妻子商量了一下，便动身前往汉口寻找。可是經過几天的查訪，不仅沒有找到儿子，連萧玉梅都沒有找到。老吳回来，又到益阳市詢問了好多地点，也同样沒有头緒。

吳明初的大儿子吳仅賢是生产大队會計，一天，从队里回来，对爸爸妈妈說：“今天报上登了篇文章，說是有人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找到了分別十几年的亲人。我看还是請公安机关的同志帮助找找仅明吧！”老吳听了，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便要仅賢連夜給鎮上派出所写信。

## 查 訪

一九六三年六月九日，益阳市公安局接到安化县梅城鎮派出所轉来的一封群众来信。信里写道：“据聞我儿家住益阳市东門口，取名湯国良。养父湯之桂或湯貴生。养母萧玉梅現在汉口某医院工作。去年暑假我儿还去过汉口探亲。……特請你們帮助寻找……。”

公安局負責同志看完这封語短意切的来信，决定先在本市查訪，如果实在找不到，再去汉口了解，并且把信交給城内派出所調查。所长丁振华和指导員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給共产党员熊美章，他們指示說：“东門口在两个管区之間，必須从两个管区开始，要依靠群众，把工作做到家。”

熊美章首先把东門口、东門外两个管区的戶口底冊查了两三遍，个别走訪了三十多家老住戶，召开了老年人座談会。一連查訪了六天，仍然沒有头緒。他曾經想作出“查无此人”的

回答,但是想到自己是人民公安干部,决不能用令人失望的結論回答自己的階級兄弟。于是,他又跑了两个管区,发动十几名基层干部一起查訪。有一天清早,他又来到了东門口和居委会治保主任周月英研究,并且一字一句把信念給她听,請她仔細地回忆。

“也許是过去在东門口小学念书的那个伢子吧!他已經參軍去了。”周月英不能肯定地說。熊美章根据这个綫索,又把两个管区一百二十六戶軍属排了队,最后落到軍属杜友秀家里。他立即来到了杜友秀家,从关心生活入手,談了三个多小时,杜友秀才說出參軍的儿子是带的,一九六三年在三中入伍了。这时,熊美章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的原因:原来,“湯之桂”和“湯貴生”的名字都不对,小湯的养父本名湯照桂,一九六一年已經去世了;一九六二年,他家又换了戶口,湯国良的名字也没有人知道,去汉口探亲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

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熊美章高兴极了,当晚向局里作了汇报,并且写了一份詳細材料。第二天,益阳市公安局向安化县梅城鎮派出所发出了一封回信。

## 重 逢

小湯穿着嶄新的軍装,胸前的五好战士紀念章更显得格外耀眼。他兴高彩烈地急行在由安化通往梅城鎮的山路上,一心想見到久別多年的亲人。当小湯来到梅城区东华公社建新大队吳家生产队,已經是在吃中午飯的时候了。

萧芝兰媽媽虽然只有五十来岁,但是旧社会里的苦难生

涯，使得她早已双目失明。儿子的回家，她又是高兴，又是难过。想想旧社会，又想想新社会，她禁不住老泪纵横，双手抚摸着儿子。儿子喊了



一声：“媽媽！”她嘴唇哆嗦了很久才說出：“孩子！是多亏党啊！是多亏党啊！把我朝思暮想的亲骨肉送回来了。旧社会使我們东逃西散，共产党又使我們合家团圆，这真是恩重如山。孩子！要好好感谢党啊！”小湯激动地对母亲說：“娘！我記住你的嘱咐，一定要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話，握紧槍杆子，保卫好幸福生活！”

“对！幸福不忘共产党，感谢恩人毛主席。”父亲插言道。

小湯有三个母亲，他的喜报应该寄給誰呢？現在，已經有了答案：小湯决心再爭当五好战士。入伍三年，三张喜报，三个母亲各寄一张。

（叶文祥插画）



# 我終於找到了亲爹

吴 润 香

## 生离死别的苦难

每当我听到老工人、老贫农提起过去，我的心头就会燃起对旧社会的熊熊烈火。在旧社会里，我的一家同许多劳苦人民一样，受尽了生离死别的苦难。

二十年以前，我家住益阳县桃花江镇，爹爹在镇头一个资本家的油盐南货店里当长工，妈妈也在这个店子里作女仆。我仿佛记得，那年一个严寒的深夜，雪花狂舞，北风把我家茅房里的孤灯刮得若明若灭。病得骨瘦如柴的妈妈躺在床上直朝地下吐血。我和大哥望着妈妈，吓得哇哇大哭。隔了好久，瘦骨嶙峋的爹爹，低着头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颤抖着双手，把一包药塞给了大哥，然后走到我的身边，呆呆地望着我。我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又哭了起来。爹爹一把抱住我，眼泪也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半天，他才断断续续地说“香呀，你救……救你的娘……不是你爹心狠，你爹……养不活你呀……”妈妈动弹了一下，爹爹连忙松开我，扑向床边。妈妈吃力地睁开眼晴，嘴唇动了动，发出了微弱的声音：“香——呀！”忽然，她那满含泪水的两眼一翻，口一张，她——死了！

那时，我还只有六岁。

正当我一家人伏在媽媽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一群人打着灯笼，闖进了我家。一个笨熊般的黑汉，伸出两只毛茸茸的大手，把我抱了起来；一个瘦猴似的家伙，拿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紅紙，逼着我爹盖了手印。我哭着罵着，打那黑汉，可是，怎么也掙脫不开他那鉄钳般的手臂。爹爹和哥哥涕泪双流，悲憤万分。就在这个黑夜里，我被抱上輪船，运到了长沙。从此，我成了一个資本家家里的“人”了，再沒有人亲切地叫我“香伢”，我的名字——吳潤香被改成了“阮萍华”。

到了阮家以后，“养父”从来不許我問起自己的爹爹和哥哥。我一問，他就罰我跪在地上，狠狠地打我。几个“养母”也都恶毒地說：“你父亲死了，你哥哥也死了！”他們采取一切手段，企图使我忘記自己的階級，充当資產階級的“孝子”。然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無論如何忘記不了我父母那勤勞、純朴和善良的形象，忘記不了我們一家生离死别的悲慘情景。

### 党是我的重生父母

黑夜終於有了尽头，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了！从此，到处洋溢着劳动人民翻身的欢笑。这时，店里的工人告訴我：“你赶快离开这个‘家’吧！这不是你的家呀！阮家为什么容下了你呢？他們早就有了打算：等你再长大一点，就把你嫁給他家‘大少爷’；……”啊！我原来是資本家的童养媳！难怪多年来他們总是这样虐待我，誘騙我。想着想着，对于这个“家”，我更加厌恶和憤恨了。这时，我已經是一个十三岁的姑娘。我在工

人的指引下，进行了摆脱资产阶级“家庭”羁绊的斗争。我离开了这个“家”，来到学校寄宿读书。在学校里，党、团组织知道我的身世以后，非常爱护和培养我，使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入了青年团。在伟大的“五反”运动中，我积极揭露了“养父”的“五毒”犯罪行为，同他彻底决裂了。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养父”不肯再承担我的生活费。然而，党给了我助学金，送我到西北农学院学习。党，就是我的重生父母。

### 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党

大学毕业以后，我结了婚，调回长沙工作。一天，我爱人拿着一张报纸对我说：“上海国棉一厂有个女工，找到了离别十多年的妈妈。我们也要把爹爹找到！”我抢过报纸，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为这位女工一家的悲欢离合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第二天，我找到后“养母”，要她给我提供寻找亲人的线索。这个后“养母”出身贫苦，是解放前被阮家强买做小老婆的。解放以后，她同“养父”离了婚。她见我去找她，便拿出一张红纸契约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卖身契！”我接过来一看，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名叫吴荣富，我是在“沅江关圣王安祠土地”出生的。至于其他情况，还是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哪，就象刀割似的：

解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有多少个过去离散的家庭获得了团圆！我想，如果我把自已寻找亲爹的心事告诉党，一定会同样得到党的帮助。于是，我把自己的卖身契拍成照片，分别寄给了桃江县和沅江县。只过了两个月，桃江县人民委员会和公安局就给我回信了。信中說：“……我們分

头調查,訪遍全县几个主要鎮头和附近公社,并无‘王安祠土地’的庙寺和地点。但过去这里来自各地的逃荒人很多,人販子成群,卖儿卖女的确实不少。我們正在继续寻訪。”沅江县人民委员会也来信說:“我們把本县許多古刹、祠堂的老道人訪遍了,他們都記不起有什么‘关圣王安祠土地’的庙宇和地址。現在我們正在向湖地、围垸打听。你不要着急,只要人在本县,我們一定要使你們亲人团聚!”沅江县人民委员会在第三次給我的来信中,还寄来一张記錄了二十多个老道人的回忆,記下了沅江境內五十多个庙宇、土地的名称,供我回忆参考。这时,我的亲爹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是,我看到党給我的亲切关怀,許多同志为帮助我找到亲人而劳碌奔波,我感动得几次掉下了眼泪。

一九六一年隆冬,一位陌生的青年忽然来到我家。他自我介绍:“我是桃江县人民委员会的,叫习銀秋。我有一个姐姐,是十八九年前卖走的。我想……”話沒有說完,他已經泪水盈眶。可是,当我把自己的情况一一說出来以后,他摇摇头,失望地哭了。第二天,他临走的时候,主动要求把我的一张卖身契照片带走了。

几个月以后,习銀秋同志給我写来一封信,說:“……从你們家回来以后,我利用假期,跑遍了桃江、沅江几个主要鎮头,寻找我的姐姐和你的父亲。我的皮鞋走开了口,又遇上大风雨,我就在沅江茅草街停下来。一位修皮鞋的老年工人告訴我:‘过河到草尾,再过河到福安公社,好象以前有个小庙,叫王安祠。’我一口气跑到福安公社,沿着大堤走了半天,在公社

办公楼的对面，看到了一点象庙址的残基。一打听，名目一字不差，不过这庙在解放前就毁了。‘吳荣富’的名字也在福安公社問到了，但是否就是你的父亲，还待查实。这几天洪水高涨，堤上人山人海，一时找他不到……”

不久以后，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又派出了干部，陪同我爱人查訪我的父亲。他們經過深入細致的工作，終于証實了福安公社的吳荣富，就是我的亲爹！啊，我千言万語也感謝不尽党！

### 双喜臨門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晚上，我爱人高高兴兴地从福安公社回来了。在他身后，紧跟着—位脸庞紅潤、挺胸闊步的老人。不用問，—看那面孔和带有特征的鼻梁，我就認出他是我的亲爹。我尽力抑制着感情的冲动，偷偷地抹干了夺眶而出的泪水，呼唤着“爹爹！”爹流着泪說：“香仔，爹爹有罪呀……”我再也忍不住了，真想放声大哭，但是怕老人家过于伤心，才拼命地把泪水吞向肚里。我对爹說：“爹爹，怎么能够怪你老人家呢？讓我們永远記住旧社会的罪恶吧！”

这一夜，我們一直談到天明。爹告訴我：我們—家，原来在沅江福安垸种田，在地主階級的残酷剝削下，在洪水的危害下，于一九三五年逃荒到桃花江鎮，帮資本家做工。由于資本家的血腥压榨，再也活不下去了，在我被卖以前，我的两个姐姐被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一个弟弟被送给了“孤儿院”；我被卖以后，我的哥哥也被迫送给人家了。最后，只剩下爹爹孤零

零的一个人，提着一只破篮在外行乞流浪。解放了，爹回到了老家，分得了田地、房屋和农具。以后，他积极地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他现在年近七十了，还当上了人民公社的老农顾问。我的哥哥、姐姐和弟弟，早已经先后回到爹爹身边。象广大劳动人民一样，全家人过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爹爹谈到这儿，忽然望着东方的红霞，高拱着粗大的手，激动地念着：“毛主席呀，你老人家真比太阳还亮！毛主席呀，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

真是双喜临门！爹来长沙以后的第七天，我的第一个孩子在安静的人民医院里诞生了。爹爹笑脸上挂着长串的泪珠，走近我的床边，说：“香呀，你娘生你的前几天，还挨过主家（资本家）的打呀！生你的那天，我正在给主家背货，主家连假也不准，你娘就只好自己生自己接了！”老人看着他红胖的外孙女，又念道：“小孙孙，你晓得吗？你娘落地的时候，还不足三斤哪！看，你长得多胖！啊，一切都是搭帮毛主席呀！”

# 生平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親爹

刘 增 伟

我三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見到我的亲生父亲。每当我想起旧社会我們家里骨肉分离、新社会父子团圆的情景，就使我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 亲生父亲在哪里？

我的亲生父亲名叫聶連生，住在常德县中河口公社西河口大队，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只晓得自己有这样一段历史：

小的时候，家在安乡县城，父亲刘玉林給一家紙烟公司的資本家干活。后来为生活所逼，父母就帶着我回到老家——衡阳市郊区。回到老家以后，家里的生活过得更苦了。父亲作了地主几亩薄田，租稅很重，一年到头，拚死拚活地干，还养不起一家人。母亲也是从早到晚，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到了一九四五年，痛心的事情发生了：母亲因为劳累过度，瘦得象根干柴，又得了痢疾病，沒錢治疗，貧病交迫死了；一个生下不久的小妹妹，沒有奶吃，无人照料，成天挨餓受冻，也离开了人間；父亲看到这个情景，十分悲痛。他的双眼得了重

病，不久就失明了。这时，地主逼交租粮，把我父亲逼得走投无路，自尽而死。

那时，我还不上十岁。父亲留给我的全部家产，只有几升糙米和一床破被。我孤苦伶仃地在一条苦难的道路上挣扎，凭自己跟父亲学来的一点劳动本领，给别人看牛、做工混日子，生活过得比黄连还苦。

解放以后，我出了苦海，见到了青天。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参了军。一九五二年二月，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参加了土改复查工作队。在部队，在地方，党总是谆谆地教导我，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一九五二年五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后，我被调到衡阳市粮食部门工作，还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不久，我同母亲娘家——安乡县的外婆家里取得了联系。一九五七年，我到那里探了一次亲。这次探亲，使我产生了怀疑。有一天，我和外祖母闲谈，问道：“外婆，我小的时候，别人说我是个野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外祖母回答说：“别人这么說，你就让他去說吧！反正你是我的亲外孙。”外祖母說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异乎寻常，同时为我母亲的死感到很伤心。我没有再问下去了，心想：“难道我不是这个娘生的，难道我还有亲人么？”我带着这个疑问回到了衡阳市。

一九五八年，我的姨父调到資兴煤矿去工作，他路过衡阳市，到我家里来玩。他告诉我，我的确不是这个娘生的，是别家的孩子。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产生了寻找亲人的心事。但是，亲



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呢？这些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四处打听，一年又一年，但是总没有下落。后来，我反复判断：我小的时候住在安乡，自己很可能是安乡县人；如果还有亲人，就能在安乡县找到。一九六四年元月份，我写了一封信，把自己迫切寻找亲人的心情和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安乡县公安局，请求帮助我寻找亲人。

### 一份加急电报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我突然接到一份从常德县拍来的加急电报。随后，又接到我亲侄儿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说：“亲叔，祖父算找到你了……盼速回家。”我含着热泪看完这封信，心里乐开了花。我寻找亲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七月中旬的一天，我按照来信的地址，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一串串金黄的稻穗、一棵棵结蕾累累的棉树，都在迎着我笑，我的心



境无限的开闊。

父亲見了我，大步跨来，紧紧拉住了我的手；哥哥、嫂嫂和侄儿、侄女，个个喜臉相迎。但是，誰也沒有說一句話，每个人的喉嚨里好象被什么塞住了，每个人的脸上滚动着一颗顆的泪珠。

父亲对着我看了又看，然后才說：“呀子，你真象你死去的二哥哥啊！自从你在娘肚里离开我以后，如今三十年啦！真想不到今天还能团圓！这是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哇……”

### 一段血泪史

在同父亲几次长談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家在旧社会里还有一段十分惨痛的血泪史。我應該把这些事情告訴大家，来控訴旧社会的罪恶，歌頌新社会无比的优越性。

一九三五年，梅雨季节，常德涨大水，穿了不少的堤垸，到处一片汪洋。房屋被冲倒了，田土被淹沒了。当时，我家六口人，我还怀在娘肚里。本来家境就不寬裕，大水以后，一貧如洗，日子更难过了。四个哥哥、姐姐，围着父母亲要飯吃，沒有办法，母亲就带着四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我，随着逃荒的人群离乡背井，流浪他乡了。父亲一个人留在家里，給地主做长工，打零工，过着牛馬般的生活。

母亲带着孩子沿路乞討，最后逃到了安乡县城。那时，我的大哥不上十岁，二哥只有八岁多，为了活下去，母亲不得不把他們送去当学徒，替資本家卖力气。不久，母亲生下了我，起名安清。生活的担子更加重了，每天連稀飯也喝不上，餓得我

和两个姐姐死去活来。一个好心的婆婆见了，同情地对我母亲说：“聶嫂，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饿死啊，想个办法吧！”母亲只是伤心地流着泪，没有回答。那婆婆又说：“对面有个叫刘玉林的，衡阳人，没有崽女。你就把安清送给他吧，好抽出身来，替别人做工啊！”母亲含着泪，点头同意了。从此，不上半岁的我，就变成了刘家的孩子。刘家给我起了个书名，叫刘增伟，就是我现在的名字。

母亲把我送给刘家以后，自己就到安乡县城一家旅社里，给资本家熊胖子做佣人。她白天黑夜地干活，赚的钱却糊不住口。我两个姐姐无人照顾，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学银匠的二哥，在资本家恶毒的压榨下得了肺病，不久也死去了！母亲的心哪，就象插进了一把锋利的尖刀，万般的剧痛。再加上资本家的欺压，她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不久也离开了人间。这就是我一家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 党使我父子重逢

父亲知道我成了刘家的孩子以后，万分悬念。解放以前，他请人写过三四十封信寻我。但是，在旧社会里，反动派只会弄得穷人家破人亡，哪里会管你这些事！一封封的信，都变成了一片片的废纸屑，沉入了汪洋大海。

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换了人间。学铁匠的大哥聶宏太，回到了家乡成家立业，同父亲聚居。一家七口人，吃穿不愁，生活过得真幸福。但是，父亲时常思念着我，特别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更是心绪万端。解放以后，他也曾打听过我的

下落，但是沒有得到一点音訊。一九六四年，他又打发我哥哥的大崽、我的侄儿聶景云去安乡找我。

党和政府高度关心人民。安乡县公安局接到我的信以后，就立即向县委汇报，派干部五次到我养母娘家調查訪問，发动群众給我找亲人。

党和政府为我寻找亲人做了許多的工作，就为我侄儿找到我創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天，我侄儿在一家飯店里打听到了我的主要綫索。飯店一个姓刘的服务員，还介紹他到我的养母娘家——离安乡县十多里的地方去打听。我侄儿到那里找到了我的养舅朱臣清。养舅听說是找我的，連忙把我小时候怎样在刘家撫养，以及去衡阳的情况作了一番詳細的介紹。侄儿高兴极了，回到家里給我父亲一說，全家无不兴奋得流泪。父亲馬上到邮局給我拍电报，要我回去探亲。就这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关怀下，我終於和亲生父亲团圓了！

（李德育記，顏家龙插画）

# 团 圆

李 金 云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上午，天气闷热，我穿着一件背心，正在忙着生产。忽然有个同志走进车间，站到机台边问我：“你这位同志贵姓？”听声音，是个本地人。“姓李！”我随便答道。“叫什么名字？”“叫李金云！”“叫李金云？你家在哪里？”我感到有些奇怪，便正经地回答说：“益阳市大码头后面‘白骨塔’的。”“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他迫不及待了。“叫李冬生！”我的话音刚落，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鼻子抽动着：“金伢子，你……你……，你还活着，我……我是你的二哥！”我猛地一怔，心想喊句二哥，喉咙里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只是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顿时，两双手被掉下的泪水淋湿了。



我和家人失散了十七年，今天两兄弟突然相遇，真象作梦一样。

从二哥口里得知，那年我和媽媽他們在安乡街上失散以后，媽媽和二哥不久就回到了益阳。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媽媽带着二哥和大姊，改嫁到湘阴县的一个农民家里。一九五八年，二哥又回到了益阳，在金花湖蔬菜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生产（現在益阳人民砖瓦厂工作）。

这天上午，他从街上卖菜回来，路过我們工厂，看到厂里几个窗口都站满了人，他也好奇地挤到窗口张望。我的机子离窗口很近，偶然間，他发现了我在左胳膊上那块胎生的銅錢大的紫紅色印記，就想起十七年前在安乡街上失散的我来。于是，他赶忙跑进車間来問我。

二哥把找到我的喜訊告訴在湘阴的媽媽和大姊，她們来到了厂里。骨肉失散多年，这天重逢，悲喜交集。媽媽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摸着我的头說：“金伢子，你还活着，我以为你早死了呢！”

“虽然沒死，在旧社会里，苦也受够了！”我說。

“你的眼睛是怎么坏的呢？”

“那时找你們不到，整天挨冻受餓，挨打受罵，我不懂事，只会哭，把眼睛糟蹋坏了……”

我話沒落音，媽媽和大姊突然大哭起来。媽媽断断续续地說：“金伢子，我們到底看到你了！可惜你看不見媽媽了！”

“要不是解放，恐怕你們也看不到我了。”我安慰着她們。

.....

媽媽現在和大姊同住在一个生产队里，生活过得很好。媽媽改嫁到湘阴又生了三个孩子，解放以后，大孩子讀了一年初中，現在在生产队担任會計。我大姊現在也是四个孩子的媽媽了。

說来真是令人兴奋，一九六二年八月，我刚从湘阴探問媽媽回来，二哥又把失散多年杳无音信的二姊找着了！她不但活着，而且已有一个四岁的孩子。二姊夫是个搬运工人，每月收入五十多元，同媽媽、大姊一样，生活都过得很好。令人难过的是，和我同胎生的那个妹妹与我們离散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从二姊口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不禁使我回忆起解放前骨肉失散、受苦受难的凄惨生活来。

解放以前，我爸爸是个碼頭工人，全家九口，就靠他一条扁担养活。不料，在我三岁那年的秋天，爸爸因为劳累过度，病倒在床上，沒有錢延医診治，病了两天，就和我們永別了！

苦难的媽媽，她怎能負担起这八口之家的生活？她沒有办法，只得强忍着眼泪，把十二岁的大姊，送到益阳市一家烟厂里給資本家当童工，然后带着我們到外地乞討。記得是爸爸死后的十来天的一个中午，十六岁的大哥（他发育不良，个子矮小，看上去不过十二三岁）挑着爸爸唯一的遗产——一担不知补过多少次的籬筐，八岁的二哥牵着五岁的二姊，媽媽背着两岁的端白妹，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和我同胎生的玉珍妹，眼泪汪汪地离开了家，开始过起到处流浪，餐风露宿的乞討生活来。

一天，我們在一条堤上走走歇歇。由于几天来只喝了几口

米湯，吃了一點野菜，大家都頭重腳輕，四肢無力，一坐下來，就不想再起身了。這時夕陽西下，遠處炊煙裊裊，哭了一整天的小妹妹，含着媽媽干癟的奶頭，一聲不響。媽媽還以為她睡着了，口里還不時催促我們：“起來走，前面有人煙，討點東西給端白伢子吃！”媽媽將凝視遠處的目光收回來，望着懷里的小妹妹，突然臉色變白，大聲驚叫着：“端白伢子，端白伢子！你——”我們兄妹都圍了攏來，只見端白妹再也不哭、不笑、不叫了，兩個小拳頭緊緊地握着，她活活地被餓死了！

在求乞途中，大哥是媽媽的得力助手。可是，一個炎天暑熱的中午，我們在南縣城關鎮大碼頭河邊要飯，他走着走着，突然倒在地上，口里冒着白色的泡沫，雙手在地上亂抓，兩腿亂蹬。這突如其來的急症，弄得我們驚慌失措。媽媽頓時急得瘋了似的，一屁股坐到地上，使勁地拉着大哥的一只手，拼命地喊着：“純伢子！純伢子！你怎么啦？”我們兄妹呆立着，哭个不停。可憐的大哥，只過了幾個鐘頭就落了氣！

大哥一死，餓得骨瘦如柴的媽媽，再也無法担起這一家的生活重担了。大哥死去沒幾天，她便忍痛把五歲的二姊和三歲的玉珍妹送給別人。媽媽怕她倆不去，事先沒跟她們講，甚至連我們兩兄弟也不知道。分手的那天，只見兩個船老板走上岸來，裝着笑臉，對我二姊和妹妹說：“來，小姑娘，跟我到船上去拿飯吃！”二姊和妹妹聽說有飯吃，高興極了，就跟着他們上了船。當時，我有些詫異，就問媽媽：“怎么不叫二哥去拿呢？”她沒有作聲，只是淚下如雨。二姊和妹妹剛剛上船，船就開了。這時，她倆明白過來了，拼命地在船上哭着，喊着。船上的人，七



手八脚地把她俩按倒在船舱里，骂道：“小丫头，哭什么鬼！”我们三个坐在河边，妈妈紧紧地把我和二哥搂在怀里放声大哭，我们兄弟也哭倒在妈妈的怀里。码头上的一些工人看了，莫不摇头叹息。

九口之家，就这样死的死，散的散，最后只留下妈妈、二哥和我三个人了！妈妈带着我和二哥，又流浪到了安乡。一天早晨，我肚子饿极了，便一个人端着一只碗，到街上去讨东西吃。走着、讨着，走着、走着，串过几条小街小巷，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边哭边喊，串来串去，走到街的尽头，天黑了，再也找不到妈妈和二哥了。

离开了妈妈和二哥，我好象一只离群的小孤雁，无依无靠，生活比以前更加凄惨。记得我八岁那年，一个深秋的早晨，在沅江的乡下，看见前边有一座大瓦屋——看样子是有钱人家——，便去讨饭吃。这时，这户人家正在吃饭。凭经验，人家不吃完是不会给的，我不声不响地靠着大门坐下来。哪晓得刚刚坐到门槛上，这家的男人瞪了一眼，恶狠狠地骂道：“哪里来的小杂种，快滚开！莫把老子的门槛坐脏了！”我心里一惊，应声而起，靠着门框站着，低声恳求道：“做点好事，开销一点囉！”“狗婆养的，还不给老娘滚开！”女人帮了腔，看样子是那个男人的堂客。我向她说道：“就给半碗……”不等我说完，那个男人就把碗筷一放，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揪住我的右耳朵，用力往地坯里一推。我一个踉跄倒在地上，那只缺口的粗磁碗，“噹！”的一下，四分五裂了。一眨眼，我感到右腿上猛地一阵剧痛，偏过头去一看，一条大花狗正在咬着我那右腿。我一

骨碌爬起来，拖着血淋淋的右腿，一跛一跛地跑。这右腿后来整整烂了半年，至今还留下一个大伤疤。

在长年的流浪生活中，受尽冻饿、惊吓和欺凌，我的眼睛经常泡在泪水里，慢慢由红肿变得模糊起来，还没到解放，就完全失明了。我成了瞎子，生活更加凄惨了！

.....

解放以后，世道变了，我这个双目失明的“流浪儿”也成了国家的主人——工人，而且失散多年的一家也重逢了，这真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我怎么也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我一定永远记住旧社会的苦难，永远记住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 佳节会亲人

李显红

我和离别三十年的生身母亲重逢了！这是在一九六三年中秋节的那天。晚上，月亮分外皎洁，我和母亲，还有左邻右舍的社员们，围坐在禾场边的桂花树下，满腔愤怒地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给我一家造成的灾难，无限欢欣地倾吐了新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现在，我想起母子重逢的情景，想起我一家在解放前所受的苦难，真有千言万语要向亲爱的党说出来。

## 逃荒异乡 家破人亡

我原是邵东快活桥汪家院的人，全家六口，父亲叫汪银生，母亲叫姚俊全，还有个七十岁的奶奶、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九三四年，我父亲用帮工得来的几个钱，租了地主赵三胡子的十八亩田种。哪晓得屋漏偏遭连夜雨，那年受了大旱，颗粒无收。狠心的地主，仓里老谷压断梁，却不管佃户家的死活，三番五次地派狗腿子上门逼租。我家交不起租，地主就逼我家退佃，还拖走了我家的黄牯。我那刚满三岁的弟弟饿死了！爹妈无法，只得带着我和未满一岁的妹妹沿门乞食，逃荒到靖县甘棠坳。

到了甘棠坳，举目无亲，全家更是陷入了绝境。这时，同乡

的“彭屠戶”來“幫忙”了，他為我們向地主謝生太租了一間破房子安身。

不久，妹妹被飢餓和疾病折磨死了；爹爹得了嚴重的疾病；逃荒到靖縣做長工的外公，也因病被地主趕了出來，死在觀音閣庵堂里。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彭屠戶”却帶着狗腿子來逼房租。“彭屠戶”是地主謝生太的管家，在地主的豢養下，專門為非作歹。但是，當時我爹爹還未識破他的詭計。這家伙一面裝好人，對狗腿子替我爹爹“求情”，一面要我爹爹想辦法。當天晚上，他還送來幾吊銅錢，放在桌子上對我爹媽說：“這是我代你們向‘于木匠’借的，拿去买點東西度日，治治病吧！”在患難中，爹媽對這“好心腸”的鄉親，真是感“德”不淺。誰知錢用光以後，他便經常來我家逼債。有一次，“彭屠戶”來討債，我爹躺在草窩里呻吟道：“哎！鄉親哪，我們都快餓死了，哪有錢還債哩！”

“辦法倒有，不過話難開口。”“彭屠戶”故意裝正經地說。

“有什麼辦法？給出個主意囉！”

“我講，不如把你老婆賣給‘于木匠’算了。”

爹吓懵了：“什麼？叫我賣老婆！”

“如今世道，三十六計，救命為上計。你把老婆賣了，一可抵債交租，二可醫病、混口，三可請人抬你父子回家。再說，‘于木匠’六十歲了，活不了幾年。等他死了以後，你再把老婆接回去。這豈不是一舉數得嗎！”“彭屠戶”一邊說，一邊比手划腳。

爹斬釘截鐵地說：“要我賣掉她，除非全家死光！”

“不行的話，那就請你快還錢來。還有，你欠了謝老爺的房

租不給，定会叫你用命来抵！再說，这房子是我向謝老谷租的，你們死在他屋里，連我姓彭的都脫不了身。”

这时，我爹才知道已經掉进了他們的陷阱。在这班地主、流氓的强压之下，我媽媽終于被逼賣給了劣紳“于木匠”。流氓“彭屠戶”从我媽媽身上夺取了十六块錢的“媒礼”。

我媽媽被卖的第二天，“彭屠戶”就騙着爹和我回邵东去。我刚滿五岁，还不懂事，“彭屠戶”把我装在皮籬里坐着，挑起就走。就这样，我和媽媽在靖县甘棠坳分別了。

然而，这班杀人不見血的魔鬼更恶毒的阴谋还在后面。路过会同王家坪的时候，“彭屠戶”叫他的儿子引着我往前面快走，他和我爹爹慢慢地走在后头。走到距王家坪沟大約四里路的窄路上，“彭屠戶”便趁势把我爹爹往坳脚下一推。重病的爹爹就这样跌死在高坳下了。沾滿血泪的四十八块銀元（媽媽的卖身錢），落到了“彭屠戶”的手里。

爹爹被害死以后，“彭屠戶”又把我以八块銀元、两斗大米



的身价卖给王家坪一个叫李辉明的农民做儿子。

我十岁那年，继父李辉明死了。继父死后不到几年，家里的一点点产业就被那些贪得无厌的“族长”霸占得精光。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丁派款。一九四四年，我刚十六岁，就被伪保长李明耀抓到了伪乡公所。继母急得哭哭啼啼，到处求情。最后，卖掉了六石口粮，办了酒席，还借了不少的银元送给他们，才把我贖了回家。一九四六年，伪保长林泽凡又要来抓我。我听到讯以后，便逃跑到广西，一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到家乡。

### 跳出苦海 见了青天

一九四九年，一声春雷，漫天的乌云被驱散了。我见到了青天，盼到了救命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劳苦农民斗倒了地主阶级，个个扬眉吐气了。我参加了反霸和土改运动，担任农会的文书。一九五三年，群众选我当了乡长。一九五四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调任区委宣传委员。公社化以后，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

一九六二年，我在黄毛公社工作。腊月的一天，解放前和我妈妈一同受苦的丁大伯受妈妈的委托，经过多方了解，由靖县甘棠坳来到王家坪一带打听我的下落，最后找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没有在家，他便回去了。

一九六三年农历正月初八，我的亲妈姚俊全探到我的下落以后，亲自从靖县找到会同黄毛公社看我来了。可是，我们

母子已經分離三十年，娘不認識崽，崽也不認識娘。我無法答應是她的親生骨肉，只好一面安慰她，一面妥善安排她到客棧住下。事情不湊巧。第二天，組織上要調我到涇河公社工作，我來不及把事情弄清就走了。媽媽一時也無法証實我是她的親生骨肉，也只好回去。

從這以後，我雖然不敢盲目承認自己是姚媽媽的親生骨肉，但是總把這件事記在心上。於是，我四處打聽，她是怎樣被賣掉的，我又是怎樣賣到王家坪的。記得我只有八九歲的時候，有一次在王家坪墟場上，一個擔貨郎擔的老人把我喊過一邊說：“滿伢子，你是被一個叫‘彭屠戶’的人賣在這裏的，父親被他害死了，你母親現在還活着。”我當時還不懂事，沒有理睬。現在想起來，不能不引起我深思：雖說賣身契上寫的我父母雙亡，但這一定是狼心狗肺的強盜干出來的。經過多方打聽，許多事實證明：那位姚媽媽真是我的親娘。我的心情，真是無法平靜！

### 母子重逢 月圓人圓

一九六三年的中秋，秋高氣爽，我由涇河公社起程，趕到靖縣甘棠坳去，找我離散三十年的親娘。下午，到達了甘棠坳，我找公社負責同志，核對了情況，便朝姜場背走去。見禾場上幾個婦女正在忙着打豆子，我便問道：“姚俊全媽媽住在哪一家？”

一個大嫂瞥了我一眼，說：“你問姚家伯娘么？就是她。”隨手指向在場打豆的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媽媽。

我三步并作一步走，走到媽媽面前，喊了声“娘……”，拉着她老人家的手，禁不住一陣心酸，眼淚奪眶而出。

媽媽楞住了。我忙解釋說：“我就是你老人家今年正月到會同黃毛公社找的親生的骨肉——滿伢子。”



“滿伢子！”媽媽突然聽見她離散三十年的兒子的乳名，悲喜交集，淚涌如泉，連說：“兒啊！我是在做夢吧？”

“娘，不是夢，我真是你的滿伢子！”

媽媽擦了把淚，雙手捧住我的臉，端詳了又端詳：“滿伢子，……媽媽的眼淚都流盡了，眼睛都望穿了！”

“滿伢子，快進屋里坐！”媽媽稍微平靜了下來，招呼着我。

我一步跨進屋里，媽媽什么都忘了，走到毛主席像前深深作了一個揖，激動地說：“舊社會拆散了我一家；如今，你老人家又使我母子重圓，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哪！”



母子重逢的消息飞快地传开了，贺喜的人挤满了屋子。这个说：“姚大娘，恭喜你！”那个道：“只有在新社会里，才有这天大的喜事！”有个老奶奶说得更好：“今天是八月中秋，母子重逢，月圆人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幸福的根源！”

这时，继父刘昌铨收工回来了，三个同母异父的弟妹也放学回家。原来，我妈妈被逼卖给“于木匠”以后，没有好久，“于木匠”就死了，我妈妈就和现在的继父刘昌铨结了婚。妈妈高高兴兴地向继父介绍：“这是我的大儿——满伢子！”又对弟妹们说：“登良……这是你们的哥哥，快喊哥哥。”他们都把我团团围住，问这问那。

忽然，一个老头子走进来，忙向我妈妈道喜，又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妈妈含着无限感谢的心情对我说：这就是前年腊月，我们甘棠公社党委派去找你的那位丁成其大伯。

.....

这夜，我们沉浸在重逢的欢乐之中。说不尽的喜悦，吐不尽的仇恨，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党和毛主席呀！千言万语，怎能表达我一片衷心！我一定牢记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永远不忘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颜家龙插画）